

—物映初心 特别报道—

一座五音钟，曾“当”出刘少奇的救命钱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核心提示 “这座钟刘少奇在满洲省委工作时用过，并救过他的命。”沈阳古旧钟表博物馆馆长李韬说。

在沈阳博物馆二楼展厅，一群人围着一个展柜，仔细看一座静立着的钟，它叫德国宝星三顶五音钟，通体深褐色的木质外壳，线条端庄而古朴。如今，它不再需要去典当行换钱，不再需要在深夜为革命者报时。但每一位观众走到它面前，都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仿佛能听见90多年前的某个深夜，那清脆的五音钟声穿过老北市的寒夜，在历史的深处，讲述中共满洲省委的峥嵘岁月。



这座德国宝星三顶五音钟于1929年7月同刘少奇一起从上海出发，走水路到大连，再经过铁路运到奉天（今沈阳）。

从上海到沈阳与革命者同行

上世纪20年代，北市场一带是沈阳非常繁华的地段，人口稠密，店铺林立，其中有商铺、药铺、戏园子、饭店等，穿貂皮的、着西装的、一身工装的、衣衫褴褛的，各色各样的人进进出出。192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第一个最高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共满洲省委，就诞生在这里。

这座德国宝星三顶五音钟，曾摆放在满洲省委旧址的一间青砖瓦房里。那栋房子坐北朝南，面阔六间，是上世纪20年代初典型的东北民居。灰砖青瓦，木格窗棂，朴素得丝毫不起眼，然而，就在这片朴素之中，藏着一群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人。

这座德国宝星三顶五音钟很名贵，是爱国华侨捐赠的。当年，南洋、东南亚的华侨将金怀表、西洋座钟、金银器等贵重物品从海外运到上海租界，捐给党组织。这些“硬通货”大部分由红色商号变卖，钱款一部分留在上海党中央，一部分走水路转运到沈阳，补给满洲省委。少量品相好的钟表则留在秘密机关，用作办公计时。

“这座钟于1929年7月同刘少奇一起从上海出发，走水路到大连，再经过铁路运到奉天（今沈阳）。”李韬说，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化名“赵子琪”，走陆路到达沈阳，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党中央把这座钟交给满洲省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经费短缺急用时能马上变现，二是它有多种功能，有报时和静音的功能。“分针走到3的时候打4下音乐，走到6的时候打8下音乐，走到9的时候打12下音乐，走到

12的时候打16下音乐。这四、八、十二、十六下就组成了威斯敏斯特曲，该曲是全世界最知名的报时旋律。”李韬看着这座钟向记者介绍。

当年，满洲省委不是每个屋都有钟，通过这座钟的报时前后院子的工作人员都能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到晚上或者在紧急情况下，又可以调到静音，变成“哑巴钟”，不发出声音，但不影响走时。

在满洲省委那间光线不甚明亮的屋子里，这座钟就陪伴在刘少奇身旁。白天，它沉默地记录着秘密会议的分分秒秒；深夜，它的滴答声映衬着他油灯下奋笔疾书的身影。

刘少奇在满洲省委工作了8个月。他认真整顿党组织，推进党与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的密切联系，各项工作深入开展。

典当筹款 见证至暗时刻生死营救

刘少奇到沈阳不久，在奉天纺纱厂领导工人运动时被捕。他先后被羁押在纱厂禁闭室、奉天高等检察处，历经多轮审讯威逼，但他沉着应对，严守党的机密。满洲省委积极筹款营救——取保出狱需要二百块大洋。

当时环境极其恶劣，活动经费很少，满洲省委全年总经费只有八百现大洋，整个东北几十个市县党组织、印刷传单、交通联络、吃饭住宿全凭这笔钱，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满洲省委决定把这座德国宝星三顶五音钟当掉，筹款营救刘少奇。

北市场那条街上，有一家典当行，叫“公益当”，距离满洲省委旧址只有步行几分钟的路程。掌柜冯汇川，是鉴定

西洋钟表的老行家，“公益当”也是老北市最大的钟表典当集散地。

当满洲省委的同志们抱着这座钟走进当铺时，冯掌柜一眼就认出——这是满洲省委用的东西。这座钟本来只能当五十大洋，但他给了整整一百大洋。

这一百大洋如救命稻草，将刘少奇从奉天警察局保释出来。

1998年，中央电视台联合中央文献研究室拍摄12集大型纪录片《刘少奇》。镜头前，王光美坐在一座德国宝星三顶五音钟旁说：刘少奇在满洲省委工作时用过同款的钟，而且救过他的命。后来，他特意买了一座同款钟，留作纪念。

1999年，李韬见到了冯汇川掌柜。那时的冯掌柜已是90岁高龄，老人回忆道：当年“公益当”既是老百姓存取财物之地，也是地下党偶尔用来隐蔽联络、临时寄存经费与秘密文件的备选地。

“钟表在建党、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战争中作出了很大贡献。”李韬对现场一群观展的人说，“钟表在百年党史里不只是计时工具，它是作战指挥的时间标尺、地下情报的掩护载体、工人运动的号令信物、军民情谊的见证信物。从大革命到解放战争，钟表全程助力革命事业。大量老怀表、座钟、闹钟，如今已作为一级革命文物，珍藏在各大博物馆。”

记者站在展厅里，看着这座钟，它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在展柜里。今天，它不再需要典当自己去营救谁，不再需要在寒夜里为秘密会议报时。但它身上的每一道木纹，都刻着一个政党在至暗时刻的坚守；每一次曾经响起的钟声，都在告诉人们：信仰，是可以听见的。

读书不在多，关键是要打通生命体验

——专访作家王充闾

本报记者 刘臣君



年过90的王充闾，谈及自己的40年札记时说：当时只是寻常。受访者供图

6月13日，“史笔通心——《平居日札》新书发布暨王充闾作品研讨会”在沈阳举行。这位已届鲐背之年的当代散文大家，以近半个世纪之功、400则学术札记，向读者呈上一部浸透岁月沉香的“生命之书”。

从1980年第一篇札记起笔，至今40余载，王充闾将平日的读书心得、艺文欣赏、师友交游与幽居遐想一一随手记下，日积月累，集腋成裘，最终凝成这部被学界称为其“治学路径真实写照”的厚重之作。

近日，记者对王充闾进行了专访，采访中，他谈文学，谈生命，谈治学，谈境界……和盘托出自己近半个世纪的思考。

随手记，集腋成裘

本报记者：您从1980年开始以札记形式记录心得，在您看来，这种“边读边记”的方式，有什么优势？

王充闾：札记形式，在我国学术史上，有其悠久渊源，并已成为历代学人公认的卓有成效的进学门径。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他说，札记不同于文章，亦有异于著作，但如“用功勤而征材富，亦遂自为一书，譬如蒸糟未酿酒醴，而亦可为醢渍食物之用也”。“用功勤而征材富”，这是札记的成功之本。它与碎片化的日记类备忘或素材类资料有所不同，是经过加工、充实、整合，自成一体的学术性著作。

几十年来，我已养成一种习惯，举凡阅读书报、欣赏艺文、师友交谈，以及游观胜迹、幽居遐想，心有所得，尽皆随手记下。明其理，叙其事，悟其意，存其情。或数日而得一札，或一日而得数札，注明日期，统称日札。当然，这里有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当时只是寻常”，不过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在新历史时期的精神生活的实录。但40余年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实则成了治学路径的真实写照。

本报记者：40年来，您的阅读视野从中国传统文化拓展到西方哲学、美学，这种阅读给您带来的思维改变是什么？

王充闾：改革开放给中国文坛带来了巨大变化，西方哲学、美学、史学著作大量译介，我敏锐意识到自身知识结构的短板——中国传统文化这条腿较粗，现代人文科学基础相对薄弱。为此我立下了10年补课计划，精读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美学》、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西方经典，系统填补现代思维方式与科学精神的缺项。这种“旧学”“新知”的融合，贯穿了我40多年的治学之路。这在《平居日札》中得到足够的反映。

抓住记忆黄金期，多背经典

本报记者：您提到读恩格斯《反杜林论》时做过5种颜色的批注，每次重读都有新解，怎样才算真正“读进去”了一本书？

王充闾：首先要说，我的日札与一般的资料、素材不同，如同胡适所说：“经过了一番组织安排，经过了自己的去取叙述，这时候这些知识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就是说，经过精细的整合、加工，使之由零散的变成条理的、线性的变成立体的，客观的变成主体的。这方面的工作量很大。我对于札记，是按照一个个专题，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索，选取一定的视角，进行提炼、整合、充实，具象地表述一己的思绪、认知、理念。所谓“捉意在先，成文于后”。没有先研究的耕耘，就没有后日写的收获。无论学术研究、文学写作或日常发表见解，我都习惯于从札记中发掘精神资源。思考的问题、写作的命题、研究的课题一经确定，札记中那些长期积累的人物、论述、行迹、轶闻，就形成一行行队列，次第展开，等候着调遣。“旌旗在望”“鼓角相闻”“沙场秋点兵”，好不热闹！

本报记者：您在阅读经典时，是如何将书本知识与个人的生命体验相融合的？能否分享一个由某本书引发的最深刻的“联想发挥”？

王充闾：读书不在多，关键是要打通生命体验。我对恩格斯《反杜林论》钻研较深，1971年读此书时做了5种不同颜色的批注，每次重读都有新解。对国学经典，我延续私塾传统，“抓住记忆黄金期，多背经典原文”，虽未必全解，却随岁月沉淀渐成底蕴。比如学庄子“做减法”，强调知足知止，切忌贪得无厌。一个人活得累，小部分原因是为了生存，大部分来源于攀比。当时著文发表在2015年《中国纪检监察》上。把庄子的智慧与当代现实打通。

本报记者：您强调读书要有“问题意识”，能举一个你自己在阅读中“由一问引出深读”的例子吗？

王充闾：视角选择，关乎哲学在客观实际中的具体体现与应用。可以说，哲学本身就是视角的选择。哲学的功用，在于给人提供某种智慧的、超越的、有别于世俗的视角。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就是问题学。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处理了多少实际事务，而在于能够提出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智慧始于问题。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发明千千万万，起点是一问。”一定要养成自觉的思辨习惯，自觉地强化思辨能力，长期保持活跃的思维状态，对于已知的，我思考它之所以如此的道理；对于未知结果，则通过联想做出种种设想。

用日常记录安顿内心

本报记者：您提到“人生的高境界是诗性与哲思的结合”，在阅读中如何平衡感性的审美体验与理性的思辨训练？

王充闾：我一向认为，人生的高境界是诗性与哲思的结合。而友朋

交往、观光游览，往往能以自由自在的心性展现自我。在这方面，日札中多有记述。颜翔林教授具有典型性。我们出外游览，一路上，总是随着视界景物的变换，不断地转接话题。记得那是一个风花迷醉的春晚，我们在浙江湖州街头观赏唐代诗人的雕塑群像，我提起前次来这里参观孟郊祠的情景，不禁慨叹韶华似水，瞬息经年。翔林说，人以自己的智慧创造了时间概念，设置了时间刻度，可是，在赋予时间永恒循环的活力的同时，也为自己提供了一把衡量人生有限性的铁尺，一面映射出生命短暂的冰冷无情的镜子。于是，我们又交谈了康德关于时间的“二律背反”的论说。他那敏锐的目光，易感的心灵，丰厚的腹笥，再加上强烈的理性意识与辩证思维，使其能在我们所涉足的任一富含历史与美学意蕴的场合，随时捕捉美的踪迹，阐发个中意趣。他是一个对于美极度敏感的学者，而一旦发现了美，便喜形于色，活泼得像一天真的孩子。

本报记者：《平居日札》中的“平居”二字颇具意味。显然，您是要在喧嚣的时代中，通过“平居”的日常记录，来安顿自己的内心，并保持对世界敏锐的洞察力。

王充闾：您说得对。“平居”具有双重意蕴：首先是着眼于心态，在平静生活中，以平常心态，将平日读书、创作、治学、交游中所思所感，所见所闻札而记之。而在书写过程中，我又把杜甫的“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的“思”凸显出来。这为日札的深度追求提供了理由与挑战。秋是沉思的季节，50岁过后人生进入秋景，“有所思”属于常态，我把它贯穿在这本札记之中。

■人物简介

王充闾 作家、学者。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第六届主席团委员。在海外外40多家出版社出版著作90余部，有《充闾文集》20卷。其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好书”。近40篇散文作品被选入大学、中学语文课本。作品被译成英文、阿拉伯文、泰文、罗马尼亚文。

大家谈道

■文艺艺语 YIYANYIYU

腔调可以新，根脉不能散

岳奕虹

最近，电视剧《主角》热映，秦腔这门“老掉牙”的腔调，居然让不少年轻人追得入了迷。一个放羊娃成长为秦腔皇后的故事，没有流量明星，没有狗血剧情，靠的是一股“认栽不认命”的倔劲儿。戏里那些老艺人守着的“老理儿”，在倍速追剧的时代，反而生出一种沉静的力量。

《主角》这部剧，让我联想到日渐衰微的曲艺。秦腔是戏曲，而评书、快板、鼓曲、弹词等属于曲艺，二者并非同一艺术门类，但它们共享同一个命运——新大众文艺的浪潮里，那些老艺人用一辈子守住的“老理儿”，还好使吗？

今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创作门槛低了，人人都能创作；算法主导流量，数据成了新的裁判。欣喜于众多专业创作者拥抱新媒体的同时，也不难看到一些作品变了味。我们不禁要问，曲艺的“老理儿”放在今天，哪些该变？哪些不能变？

曲艺的本质是用口语说唱故事，根子都在“说”与“叙”上。《主角》里有个细节令人动容：老戏被禁的年月，剧团散了，看大门的苟存忠却在深夜里独自登台，一招一式地练。有人不解：没人看了，还练什么？他答得平淡：“人在，戏在，规矩在。”

这个“规矩”，就是根脉，也是老艺人坚守的“老理儿”。对于曲艺而言，根脉就是“以口语说唱故事”这条底线。舞台从书场迁到直播间，段子剪成三五分钟的短视频，唱腔配上电音——这些都可以。但若为了博眼球，堆砌网络热词、稀释口语韵味、或只重唱腔悦耳，把叙事抛在脑后；甚至盲目植入小品、声乐元素，那就等于砍掉了根。形式花哨了，腔调悦耳了，曲艺却不再成其为曲艺。舞台可以换，根脉不能断。

曲艺表演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叫“跳进跳出”——演员时而化身人物，时而回归讲述者。这种半叙事半代言的范式，是神魂所在。戏曲讲究“唱念做打”，曲艺全靠一张嘴，在跳进跳出间营造万千世界。《主

角》中，忆秦娥初入剧团，师父让她练“圆场步”，一练就是3年。外人看来枯燥至极，正是这笨功夫成就了她在台上的从容。曲艺虽不需要耗腿下腰，但“跳进跳出”的功夫同样要靠经年累月的磨砺。

然而，流量逻辑偏爱“短平快”。15秒的爆发远比15分钟的铺平垫稳更受青睐。于是，不少创作者剪掉“扣子”，直奔“包袱”，将完整段子拆成金句；演员不再叙事铺陈，而是直接“跳入”角色，沦为算法的追随者。观众来不及分辨何谓“跳进”、何谓“跳出”，曲艺独特的叙事魅力便被消解殆尽。《主角》的创作团队没有急于抢风口，而是沉下心来用八年打磨剧本。这份耐心，恰是对“神魂”的尊重。曲艺的腔调可以新，但神魂不能散。

曲艺的魅力，还在于它是“场域营造”的艺术。传统艺谚讲：“不隔语、不隔音，最重要的是不隔心。”早年撂地儿，舞台就在观众中间，演员要“把点开活”，根据观众反应随时调整内容。那种活态的、双向奔赴的交流，是曲艺的生命线。

新大众文艺时代，舞台从剧场迁至屏幕，带来了“场”的危机。隔着屏幕，观众反馈化为延迟的弹幕，演员无法实时感知对方的喜好。于是，有的表演者只顾自我展示，拼命塞笑料，却忽略了屏幕那头的观众；“不隔心”的传统观演关系正在被技术距离悄然消解。其实，舞台可以移，人心不能远。《主角》热映期间，不少戏曲演员和曲艺艺人在直播中并不急于表演，而是先与观众聊天，留意弹幕中的提问，即时回应。这不正是把“现挂”功夫搬到了网上吗？善用新媒体的互动功能，完全可以在屏幕两端重新架起一座“连心”桥。

《主角》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无论舞台如何变换，守住了根、留住了魂、护好了场的艺术，终将被时代选择。戏曲如此，曲艺亦如此。“老调子”遇上了“新舞台”，老理儿依然好使——只要咱们还记着它、护着它，它就能在潮汐中把定航向，唱出新的味道。

—— 本栏目由辽宁日报、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 ——

《先声》全国百场巡演收官

本报讯 记者刘海搏报道 6月22日，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编排的大型杂技剧《先声》完成了鄂尔多斯站的演出，这意味着这部作品在2026年全国巡演圆满收官。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本次巡演在江苏南京拉开帷幕后，随后登陆厦门、衡阳、衢州、启东、泰州等地，并在泰州站实现第100场演出。巡演历时39天，横跨南北8城，演出17场，观演约1.5万人次，赢得了口碑与票房“双丰收”。截至目前，《先声》累计完成104场高水准演出。

《先声》是国内首部以杂技剧形式演绎九一八事变历史的舞台作品，该剧突破传统杂技“重技轻戏”的创作定式，历经数十轮精细打磨，将腾空飞杠、软钢丝、抖轿子等30余项高难度技巧融入抗战叙事，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再现中华儿女共御外侮的峥嵘岁月，一举斩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与文华剧目奖两项国家级大奖。

此次巡演，不仅是红色文艺精

品的跨地域传播，更是一次南北联动的红色基因对话。巡演期间，剧组参加了多场主题社会教育活动。南京首站演出前，剧组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纪念活动，将辽宁与江苏的红色记忆紧密联结，搭建起城市间精神共鸣的桥梁。泰州百场演出中，退役军人、拥军志愿者与演员同台高唱红色歌曲，“苏超”球迷现场观演，从青年视角感受红色杂技的独特魅力。此外，主创见面会、幕后探班、城市快闪等26场活动打通舞台内外，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高雅艺术台前幕后的魅力。

2026全国巡演虽已收官，但《先声》的传播之路并未止步。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将持续打磨剧目细节，深耕红色精品创作。今年8月，该剧将赴北京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在斩获两项国家级荣誉后，再度登上国家级艺术舞台，持续攀登文艺新高峰，让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永恒光芒。

沈阳故宫“和合大同”展亮相鞍山

本报讯 记者刘海搏报道 6月19日，“和合大同——沈阳故宫古建筑技术文化展”在鞍山市博物馆开展。

该展览是沈阳故宫营建400年之际推出的重磅展览，通过“关外宫阙 和合共生”与“山节藻梲 匠心传承”两个单元，对沈阳故宫的建筑密码进行深入解读。

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将后金都城从辽阳迁至沈阳，在城内营建大政殿、八旗亭等议政建筑，从而

揭开了沈阳城作为古代都城的历史。此后，沈阳故宫经清太宗皇太极扩建及清高宗弘历增建驻蹕行宫，奠定沈阳故宫今日面貌。

历经400年沧桑，这座关外宫阙仍基本保留着其官殿格局和建筑风貌。在建筑艺术上，承袭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集汉、满、蒙、藏建筑艺术于一体，反映了民族加速融合时期所独有的建筑艺术特色和厚重的民族精神内涵。

展览将持续至9月27日。